

# 廖承志与中国的对日民间外交

王雪萍

## 导 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执政经验，所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都选择向苏联学习。<sup>①</sup>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新政权，开始摸索与旧政权不同的全新外交政策。中国在冷战结构下选择了对苏“一边倒”的方针，但此方针给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尤其是对日外交带来了巨大的困难。<sup>②</sup>

从二战结束后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日本一直处于盟军的占领之下，其间美国政府的反共倾向也越来越明显。而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给中美关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美国政府也开始全面封锁中国。<sup>③</sup>《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22～23页。

② 齐鹏飞主编《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1949～200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第64～69页。

③ 井口治夫·松田康博「日本の復興と国共内戦・朝鮮戦争」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212～243頁。

美国对日本影响依然遍布国防、外交等各领域。而在《旧金山和约》的谈判过程中，中国完全被排除在外，其结果就是中国必须与日本单独和谈。但是，日本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选择与台湾当局举行议和，1952年4月28日在台北签署了“日本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日华和平条约”）。<sup>①</sup> 对于《旧金山和约》和“日华和平条约”的签署，中国政府不予承认并发表声明反对这两个条约。<sup>②</sup>

从中国政府发表的反对“日华和平条约”的声明内容，可以了解其意图为以下两点：一是批判追随美国的吉田茂政权之选择，二是强调吉田政权并不代表日本人民的民意，将改善中日关系的希望寄托于日本人民。<sup>③</sup> 中国政府对于改善中日关系之期待从建国初期的外交部档案中也能看出端倪，外交部在1950年5月连日召开关于对日和谈问题的讨论会，<sup>④</sup> 其中更进一步探讨了与日本直接通商的可能性。<sup>⑤</sup>

但是，在《旧金山和约》和“日华和平条约”签订之后，

① 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新書、2006、2～9頁。

② 《周恩来外长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声明》（1951年9月18日），《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第87～89页；《章汉夫副外长关于日本吉田政府向美国政府保证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缔结和约的声明》（1951年1月23日），《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90～92页。

③ 《章汉夫副外长关于日本吉田政府向美国政府保证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缔结和约的声明》（1951年1月23日），《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90～92页。

④ 《我外交部对日和约问题进行的讨论会会议录》（1950年5月16日下午2时），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089-03；《我外交部对日和约问题进行的讨论会会议录》（1950年5月17日下午2时），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089-04；《我外交部对日和约问题进行的讨论会会议录》（1950年5月1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089-05；《我外交部对日和约问题进行的讨论会会议录》（1950年5月19日下午2时），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089-04。

⑤ 《关于开展对日本直接贸易问题的报告》（1950年5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077-01。

日本政府继续与台湾当局保持关系，与中国大陆之间则长期处于没有外交关系的状态。而新中国成立之后与没有外交关系国家建交即成为当时中国政府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sup>①</sup> 其中当然也包括与日本邦交正常化。<sup>②</sup> 在此情况下，1952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负责对日工作之重任交给在中国知日派中享有盛名的廖承志。<sup>③</sup>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1952年以前主要担任对外宣传工作和华侨工作的廖承志在贯彻执行这一新任务时是如何收集日本信息、制定对日政策以及落实并执行对日政策的具体工作的。在本文中，首先要分析的是廖承志被点将负责对日工作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在当时人才不足的情况下廖承志启用了哪些人才参与到对日工作中来。本文主要是以廖承志及其所启用的对日工作组如何开展对日工作为中心进行分析。

关于廖承志和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中国对日外交的研究，首先要数 Kurt Werner Radtke 的著作。<sup>④</sup> Radtke 曾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长期进行调查，广泛收集了在各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的相关稿件、论文、传记、回忆录等资料，对廖承志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然而，由于其论述基本是以廖家的家庭史、廖承志的个人史为中心，不得不说对于中国的对日外交政策的分析尚显欠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75页。

② 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27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6～7页。

③ 根据王俊彦《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2006，第286页），周恩来直接向廖承志传达让他负责对日工作决定的时间是1952年4月1日。但是，孙平化在《中日友好事业的奠基人》（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三联书店，1984，第103～108页）中却说周恩来向廖承志传达此决定是在1952年5月中旬。关于传达此决定的地点，两份文献都称为中南海的西花厅。因此在本文中推定廖承志得知此决定是在1952年4月到5月之间。

④ Kurt Werner Radtke, *China's Relations with Japan, 1945 - 83: The Role of Liao Chengzhi*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在中国国内则以吴学文、王俊彦的著作和铁竹伟、王俊彦等关于廖承志的传记较为有名。<sup>①</sup> 这些著作均以传记文体描述廖承志之政治生涯，以廖与日本的关系为中心进行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具有相当高的资料价值和参考价值，但从中日外交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很难称其为学术研究。其他还有陈国文等撰写的关于廖承志的一系列研究论文，<sup>②</sup> 虽然对廖承志与战后中国的对日外交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分析，但其中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档案资料，只是引用一些回忆录和传记，作为学术研究也没有什么新发现。

本文在充分利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考了已经公开出版的曾在廖承志领导下负责对日工作的工作人员的回忆录，并对当时对日工作人员中的 28 位进行了采访。在此基础上，再参照已经公开的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中关于日本的相关档案等原始资料，以廖及其周边的对日工作人员为中心，对新中国成立后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时期的中国对日工作机制进行分析。因为本文所使用的资料中，一部分是亲华的留日学生、华侨、中国对日工作人员的回忆录以及笔者对他们的采访记录，其中包含了当事人对当时历史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完全保证资料的客观性，但在战后中日两国政府的档案资料尚未全面公开的情况下，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录、采访记录等也可以说具有相当高的资料价值，本文分析中在认识到资料存在之问题的基础上尽量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另外，虽然中国的对日

---

① 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铁竹伟：《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1998；王俊彦：《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2006。

② 陈国文：《廖承志与中日民间外交》，《中共贵州省党委党校学报》总 105 期，2006 年 5 月；陈国文、邓卫红：《廖承志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6 年第 5 期；陈国文：《廖承志与中日友好事业统一战线的建立》，《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4 卷第 5 期，2006 年 9 月；陈国文、邓卫红：《廖承志与日侨回归》，《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6 卷第 5 期，2008 年 9 月。

工作并不是全部通过廖承志进行，但建国初期中国对日工作之绝大部分是廖承志受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指示执行的，所以本文主要以廖承志为中心进行分析探讨。

## 一 廖承志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

1908年9月25日，廖承志出生于东京的大久保，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都是孙中山的革命同志。廖承志的童年时光是在东京的晓星小学校度过的，其后于1919年回国，虽然也曾进入广州的中学学习，但1927年再次回到东京，进入早稻田大学附属第一高等学院（高中）继续学习。由于从幼年就受到家庭影响，耳濡目染的都是革命事业，廖承志高中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三次被逮捕，最终被勒令退学，不得不于1928年再次回到中国。<sup>①</sup>

回国后的1928年8月，廖承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按照党的要求在上海、欧洲等地从事地下活动。九一八事变后自欧洲回国，在上海担任中国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等职，领导工人运动。1933年离开上海，奔赴川陕苏区省委，担任工会宣传部长。之后又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并参加了长征。但因为与张国焘发生意见分歧被逮捕，还被剥夺了党籍。然而即使处于被监视的状态，廖承志仍然坚持在红色中华通讯社广播部门工作，负责翻译英、日、法、德等语言的电报、通讯等。1936年，经周恩来等的努力营救，其软禁被解除，党籍也得以恢复。之后的一段时间廖一直作为红色中华通讯社的负责人，负责外国通讯社电报、电信稿件的编辑、翻译工作。<sup>②</sup>

① 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第8~29页；「廖承志文集」編輯辦公室編、安藤彦太郎監訳『廖承志文集』徳間書店、1993、15~21頁。

② 「廖承志文集」編輯辦公室編、安藤彦太郎監訳『廖承志文集』、569~573頁。

抗战时期，廖承志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并于1938年赴香港担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肩负起筹集八路军、新四军后方物资补给的任务。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以后，廖转移到广东，在准备前往重庆之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1946年被营救出来之前，辗转监禁在江西省泰和县马家洲集中营、重庆歌乐山监狱、中美特殊技术合作所、白公馆等监狱，受尽了折磨，但廖承志始终没有放弃其共产党员身份，坚守共产主义信仰。<sup>①</sup>

1946年1月，廖在中共中央的营救下出狱，5月与周恩来一同赴南京担任中共南方局外事委员会副书记，隶属于南京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协助周恩来的工作。同年9月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等职务。其后还曾历任中共南方局委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廖承志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作为党的领导人负责各方面的工作了。<sup>②</sup>

##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日外交方针

新中国成立初期，廖承志曾担任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台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外交协会理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

---

① 「廖承志文集」編輯辦公室編、安藤彦太郎監訳『廖承志文集』、573～576頁。

② 「廖承志文集」編輯辦公室編、安藤彦太郎監訳『廖承志文集』、575～577頁。

中国人民儿童保护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拥有数不清的头衔。<sup>①</sup> 拥有如此众多头衔的廖承志，是不可能担负起所有这些机关的具体工作的。那么，为何要赋予廖承志如此众多的头衔呢？可以认为其中一部分是为了开展对日工作所需要的“民间”身份。<sup>②</sup> 那么为什么作为党政领导人之一的廖承志还需要如此多的“民间”身份呢？其实这与中国的对日工作方针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对外关系受对苏“一边倒”方针以及反对美帝国主义政策的影响，在国际上持续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因此，与许多国家未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直至1956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以印度、越南为代表的邻国和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加在一起总共也只有27个。西方发达国家之中只有英国和荷兰两个国家承认了中国。<sup>③</sup>

在此情况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中国的外交方针定位为“对已建交的国家要以政府外交为主，民间外交为辅，对未建交的国家，则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努力推进改善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关系。<sup>④</sup>

推进与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并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也随之成为新中国的重要外交课题之一。当然，周恩来的上述外交方针同样也适用于日本。正如周恩来如下所述，推动中日民间交流之最终目标即邦交正常化。

---

① 铁竹伟：《廖承志传》，第197页；「廖承志文集」編輯辦公室編、安藤彦太郎監訳『廖承志文集』、576～588頁。

② 对原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丁民的采访，2011年11月23日，北京。

③ 王雪萍「中国の文化外交——留学生派遣を含めた人材交流に見る戦略」川島真編『中国の外交——自己認識と課題』山川出版社、2007、55～72頁。

④ 夏衍：《永远难忘的教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第20～28页。

从展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开始，从增加人民交往开始，从增进民间团体协商开始来打开中日关系。只要人民互相来往通商、友好合作，日本人民的大多数都会认识到中日之间恢复邦交首先对日本人民有益，对中国人民也有益，从而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政策。……尽管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正常关系，而且按照国际法还存在着战争状态，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两国人民的友好活动和签订民间协定。这样先从民间的频繁来往并且达成协议开始，把两国关系大大地发展，最后就剩下在外交上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正常关系了。<sup>①</sup>

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在对日民间交流活动中，中国政府竭尽心力开展了精心细致的工作。而负责这些具体工作的就是廖承志及其下属的对日工作组。

那么，中国所指的对日民间外交中“民间”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外事工作中有一句名言叫“外事无小事”，由此可知当时中国政府是把与外国交流的工作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的。周恩来在1950年3月10日对被选拔出来的新中国外交官讲话时曾经做出“外事工作授权有限，所以你们要经常向国内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的指示，由此可知对中国政府来说所有外事工作，不论事情大小，全部都被置于政府、党中央，具体来说就是周恩来的管理之下。<sup>②</sup> 所以，可以说对日外交对中国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完全交给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机构或者个人来推动的。换言之，所谓的中国对日民间外交，对于国内或国外，实际上是采取了

① 江培柱、邱国洪：《中日关系舞台上的辉煌乐章——周总理指导对日工作的思想与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226~234页。

② 《周恩来：共和国首任外交部长》，何明主编《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第1~6页。



不同的标准。即虽然在国内完全是由政府、党中央来控制，但对外使用的却是“民间”身份，而对于国外，具体到对日本方面来说，交流对象则主要限于民间。

中国之所以要开展民间外交，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 (1) 日本国内亲华势力的发展

在中国内战已经明显出现中共胜利之倾向的1949年5月，在日本国内，中日贸易促进会和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就已相继成立。同年6月，中日贸易协会也宣告成立。<sup>①</sup>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各地的华侨组织、中国留学生团体也立刻表示支持新中国，并召开了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大会。<sup>②</sup>1950年10月1日，在东京一桥的教育会馆汇集了来自日本全国的各界人士约1000人，纪念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同时还举行了日中友好协会的成立大会。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为松本治一郎（前参议院副议长），理事长为丸山完造（吴山贸易社社长），副会长为丰岛与志雄（日本笔书俱乐部干事长）、原彪（社会党众议院议员）、平野义太郎（中国研究所所长）、林炳松（华侨总会会长）。所有这些团体都表示支持新中国，主张与中国开展贸易交流，并进行友好活动。<sup>③</sup>

廖承志一直都在关注日本国内的这些动向，同时也能理解在日本国内成立的希望推进与中国的贸易和友好交流的民间团体所表现出来的亲华态度，为数众多的知名人士加入这些亲华团体，而他们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巨大等具体情况。廖特别认识到，日中友好协会将成为日本和中国进行友好交流的窗口，所以从该协会创立之初就表现出了对它的支持，同时也积极与其取得了联系。在此基础上，还将《人民日报》《大公报》等

① 日本恢复独立后，此三团体的名称的开头都改为“日中”（日中友好协会编『日中友好運動五十年』東方書店、2000、16頁）。

② 王雪萍「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203～232頁。

③ 日中友好协会编『日中友好運動五十年』、9頁。

中国的报刊邮寄给日中友好协会，并通过该协会分发给日本各地的其他各种团体。<sup>①</sup> 中国政府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与日本政府开展交流活动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与日本民间团体发展友好交流的余地却很大，所以就做出了“以民促官”的决定。<sup>②</sup> 通过其后这一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可以看出，尽管在某一特殊时期中国政府也有过完全拒绝与日本政府交流的情况，但与日本民间的友好团体、友好人士的交流却一直持续，基本上没有中断过。<sup>③</sup>

## (2) 冷战环境下日本外交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关于从二战后至朝鲜战争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添谷芳秀在其著作中曾经做过详细的分析。添谷指出，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越发强硬，并实施了对华禁运。同时美国还迫使日本政府与其采取同样的政策。<sup>④</sup> 此时尽管包括经济团体在内的日本国内舆论强烈要求重新与中国开展贸易交流，但成为中日贸易最大壁垒的则是美国主导的对中国全面禁运的政策。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之后，美国政府就决定对华实施全面禁运，美国占领下的日本也仅保留经由香港的对华间接贸易，其他所有直接贸易都被迫采取了全面禁运的措施。<sup>⑤</sup> 虽然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禁运有所缓和，但政经分离的方针在日本政府内部却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sup>⑥</sup> 因此，根据大泽武司的研究，当时的日本，受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影响，

① 王俊彦：《廖承志传》，第284～285页。

② 萧向前：《周恩来同志对发展中日关系的卓越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212～225页。

③ 《我对中国、日本民间交流的方针》（1958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899-08。

④ 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 1945～1972』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5、33～97頁。

⑤ 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75～150頁。

⑥ 陳肇斌『戦後日本の中国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3頁。

长期拒绝与中国大陆直接接触。日本的态度，甚至影响到包括人道问题在内的中日两国的未解决问题上，将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尽可能地降低到最低程度。<sup>①</sup>

### (3) 中国对于日本对华政策的认识

随着《旧金山和约》和“日华和平条约”的签订，以及日本与美国一起实施对华禁运，中国认定日本政府完全是一个追随美国的政权，采取的是敌视中国的政策。故此，中国决定不与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发展关系，而通过发展与日本人民的友好关系，来打开两国改善官方关系的道路。<sup>②</sup>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国内有发展中日民间交流的土壤。而考虑到日本政府当时对中国的态度，中国当然不可能选择日本政府，那么选择限定于与日本政府以外的民间力量强化关系、促进发展即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既然认为民间交流是唯一可行的方式，从1952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下定决心倾尽全力促进对日民间交流。然而，这里所指的“民间”只是限定在日本一方。也就是说，只是将日方的谈判对象、交流团体限定在“民间”，至于中方仍然是全部由政府来主导。不过，为了便于操作，既然日方对象限定在“民间”身份上，那么中方也必须赋予对日工作人员“民间”身份，这也就成为了廖承志及其部下有很多头衔的原因之一。

## 三 中央决定由廖承志负责对日工作

对于廖承志受命接手对日工作的情况，王俊彦在《廖承志传》一书中有如下描述：

① 大澤武司「在華邦人引揚交渉をめぐる戦後日中関係——日中民間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研究』第49卷第3号、2003年7月、54~70頁。

② 《论中日关系》，《人民日报》1953年10月30日。

廖承志再次被周恩来请到西花厅。周恩来让他看一份党内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和有关中日关系问题的宣传文件，只见毛泽东在文件上做出明确批示：“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周恩来等廖承志看完文件，就以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廖承志，仔细交代说：“毛主席的指示就是中央决定的对日方针。中央决定开展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日本方面的问题决定由你兼管。南汉宸和雷任民到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按原定设想已经邀请了日本代表访问北京……接待工作由你从日本小组里派两个人负责。”<sup>①</sup>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由廖承志负责对日工作，是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的决定，也是在周恩来直接说明之后廖才承担起中国的对日工作的。中央决定让廖来负责对日工作，并不单单是因为廖出生于日本，并有过日本留学的经历，还和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就长期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地下工作，经受过残酷斗争的考验，深受党的信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再加上从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认识廖承志的周恩来熟知廖的经验和能力，而且二人长期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sup>②</sup>另外据说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就廖承志对日本问题的处理能力给予过高度评价。例如，王俊彦在《廖承志传》中就曾经提到过以下三点：<sup>③</sup>①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让廖承志组织成立一个研究日本问题的小组，作为他的日本问题智囊机构；②1950年3月9日晨，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在向周恩来汇报关于麦克阿瑟准备释放日本战犯的问题时，谈到了外交部缺少懂日本问题的得力干部，周恩来便让他去请教廖承志；③在美国公

① 王俊彦：《廖承志传》，第286页。

② 胡鸣「周恩来と廖承志——中国革命から中日友好へ」王雪萍編「戦後日中関係と廖承志——中国の知日派と対日政策」慶應義塾大学大学出版社、2013、265～278頁。

开对日和谈的原则后，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和廖承志的日本研究小组开会，廖不仅参加对策研究，还参加了之后中国的一系列抗议活动。<sup>①</sup>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廖承志就一直兼任周恩来的日本问题顾问。从周恩来从1949年至1958年一直兼任外交部部长、全面负责中国的对外工作，以及周廖的亲密关系来看，也可以认为1952年中央让廖承志负责对日工作是一个必然选择。中共中央的决定通过周恩来直接传达给廖承志，而对于一些具体工作的操作方式，则常是周恩来在听到廖承志的报告后，当场做出决定的。<sup>②</sup>

## 四 廖承志与中国对日工作机制的变迁 (1949 ~ 1972)

###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日本形势的观察期(1949 ~ 1952)

在新中国成立时，前中共中央外事组改组为外交部，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sup>③</sup> 中国外交可以分为官方外交和党际外交两种。官方外交是指由外交部负责的，基本上是与已经缔结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的相关事务。党际外交主要是指以发展与外

① 王俊彦：《廖承志传》，第279~281页。

② 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84页）中收录了1953年2月15日周恩来就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回国问题给廖承志写的信，信上有对于此问题的指示。《周恩来：中日关系的奠基者》（王俊彦《中日关系掘井人——记45为中日友好的先驱》，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第20~43页）中也有关于周恩来根据廖承志提供的资料处理日本问题的情况，以及周恩来对廖承志发出的关于对日工作的直接指令的相关内容。还有其他很多文献中收录了周恩来直接指示廖承志处理对日工作的记录。

③ 王炳南：《回忆周总理在外交工作中几个片断》，《世界知识》1979年第1期。

国政党之间关系为目的，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负责的工作。在已经公开的中国外交部档案中，有一些关于收集日本相关信息、分析当时日本形势的档案，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讨论过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但是在1952年春天以前却未能具体形成对日政策。<sup>①</sup>

## 2. 廖承志构筑领导对日工作机制时期（1952 ~ 1958）

如前所述，1952年春廖承志被任命为中国对日工作的负责人。受命之后，廖开始组建对日工作组。考虑到当时中国对日外交的国际环境，是既无进行官方外交、也无进行党际外交的可能，所以无论是外交部还是中联部，都不是能够具体执行对日工作的部门。故此，不得不让刚刚组建起来的以廖承志为首的对日工作组来负责起这一“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使命。然而，可以说这一对日工作机制的组织结构又极为特殊。作为领导的廖承志，一方面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但另一方面，为了推进与日本的民间交流，又需要众多的民间身份。如此，廖承志下属的对日工作组中的工作人员也大多需要民间身份，并且不需要进入外交部工作。例如，据从1955年开始就长期在外交部从事对日工作的丁民介绍，1955年以后的外交部日本科（后改为处），因为中日两国间没有官方往来，当时完全是处于一种无事可做的状态。<sup>②</sup>

① 《关于日本赔偿概略》（1949年10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1-00052-05；《关于承办日本细菌战犯问题座谈会纪要》（1950年2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092-01；《对日和约有关接触日本军备条约草约》（1950年3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090-01；《各国关于对日和约军事问题的意见》（1951年2月1日~2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091-01；《研究美对日和约问题及我之对策》（1951年8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090-02。

② 对原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丁民的采访，2011年9月26日，北京。

既然对日工作不由外交部来负责，而中央又已经将其置于民间交流的位置上，那么从事民间交流的对日工作人员的需求也随之增加，需要重新选拔、培养。所以，从1952年接管对日工作之后，廖承志就开始着重选拔对日工作人员，并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廖不得不大力选拔和培养对日工作人才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日工作人员严重不足，这也与中国政府对外事人才的使用原则有关。

1949年夏天，作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之一，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的原则。其意就是要“同旧中国丧权辱国的外交一刀两断，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将住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sup>①</sup>也就是说，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所缔结的一切外交关系，宣布要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所有国家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明确地表明废除此前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所持的一切外交特权。<sup>②</sup>中国不仅将这一原则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还将其适用于新中国建立后外事工作人员的选拔上。

1953年从日本回国的华侨王达祥曾这样回忆：我回国本来是希望上大学的，但回国后很快就在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安排下，到共青团中央联络部，开始参加对日工作了。那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选拔外事工作人员也要求“另起炉灶”。从伪满洲国和抗战时中国各地伪政权曾重视日语教育的情况来看，可以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国内并不缺少日语人才，之所以造成对日工作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是因为中国的外事工作人员必须依据“历史没问题，家庭出身好”的原则进行选

①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2~3页。

② 薛学共、黄小用编著《周恩来超群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第202~203页。

拔。其结果是，原来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因为与旧政府的关系不能用，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区的日语人才也因为与日本伪政权的关系被视为有问题，这些人都被列为不能成为新中国的外事工作人员之人了。<sup>①</sup>

“另起炉灶”的人才选拔原则，在迄今所公开的中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中尚未发现，仅在郭伟伟的著作中有所提及。<sup>②</sup>但在1949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给华南（分）局组织部的关于外交人员选拔条件的电报中可以发现对这一原则的佐证。根据该电报，中共中央组织部所要求的外交人员选拔条件为以下四点：①政治上忠诚可靠；②知识丰富，外语水平好；③稳重周到，能准确完成上级指示的工作，服从上级领导；④师、团级以上干部。<sup>③</sup>

以上条件中的“知识丰富，外语水平好”对外交官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从条件的顺序来看，“政治上忠诚可靠”这一政治条件却是选拔人才的绝对标准。这些标准在1950年3月10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一起接见中国的外交人员时毛的讲话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现在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他举例说，汉代的班超、张骞也不懂外语，不照样出使西域，并且不辱使命、功绩卓著吗？他幽默地对大家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sup>④</sup>

① 王达祥：《与祖国同行》，《回国五十年》编写组《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第146～150页

② 郭伟伟：《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第190～211页。

③ 《中组部关于外交人员选派条件的电报》（1949年12月21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710页。

④ 《周恩来：共和国首任外交部部长》，何明主编《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第1～6页。



毛泽东讲完这段话后，周恩来也曾插话说了“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的话，更加强调中国在选拔外交官时最为重视的是政治上的忠诚可靠。如此可以看出，统筹外交、外事工作的周恩来在选拔、培养新中国的外交、外事人员时，完全是站在重视政治立场的角度上的。<sup>①</sup> 廖承志则完全按照周恩来的方针执行，而且在选拔、培养对日工作人员的过程中，廖还经常向周恩来请教和汇报。<sup>②</sup>

关于廖承志选用对日工作人员的办法，笔者在其他论文中有过详述，<sup>③</sup> 在此仅简单列出以下五种。<sup>④</sup> ①从新中国建立前就在中共党内一直从事日本相关业务的干部中选用。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后来被称为“廖承志四大金刚”的王晓云、赵安博、萧向前、孙平化。<sup>④</sup> ②廖承志和他的直属部下从他们认识的精通日语的年轻人中选拔。<sup>⑤</sup> ③从回国的留日学生、华侨中选拔。<sup>⑥</sup> ④从日本回国后进入华侨补习学校（以下简称华侨补校）或新中国的大学中接受过某种程度教育的留日华侨中选用。<sup>⑦</sup> ⑤从新中国的大学中培养出来的日语专业大学生中选拔。<sup>⑧</sup>

从以上渠道召集起来的对日工作人员，分别被分配到外交

- 
- ① 《周恩来：共和国首任外交部部长》，何明主编《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第1~6页。
- ② 甘步师：《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302~315页。
- ③ 参见王雪萍「廖承志と廖班の対日業務担当者」王雪萍編『戦後日中関係と廖承志——中国の知日派と対日政策』、15~48頁；王雪萍「中国の対日政策における留日学生・華僑——人材確保・対日宣伝・対中支援」王雪萍編『戦後日中関係と廖承志——中国の知日派と対日政策』、107~131頁。
- ④ 《王晓云：国务院外办日本组负责人》，王俊彦：《中日关系掘井人——记45位中日友好的先驱》，第183~190页。
- ⑤ 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三联书店，1984，第258~259页。
- ⑥ 王雪萍「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203~232頁。
- ⑦ 对回国留日华侨学生林国本的采访，2007年11月26日，北京。
- ⑧ 芮敏：《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见证人——王效贤》，《对外大传播》2003年第5期。

部、中联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对外友好协会、外交学会、共青团中央、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人民日报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等各部各机关的对日相关工作部门。<sup>①</sup>但组建对日工作机制，并不是将这些工作人员分配到各个机关部门就算完成。其后，廖承志不但更进一步地扩充工作人员的数量，而且还言传身教培养他们。1953年，廖承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并在委员会内设置了日本组，作为日本组的领导，廖承志开始不定期地召开会议讨论对日相关政策。<sup>②</sup>日本组（后来其上级机关发生了变化）这一名称一直使用到“文革”以后，泛指以廖承志为首的对日工作组。

从参加日本组会议的成员情况来看，由于日本组的会议首先是廖承志召集各部门负责日本工作的相关人员讨论日本问题，因此参加成员也根据议题不同会有所变化。<sup>③</sup>从1952年到1954年，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而战后仍留在中国的日侨的回国问题、战后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的回国问题、中国在日本去世的烈士遗骨的送还问题等，都通过两国的协商得到了一定的解决。特别是在在华日侨回国的问题上，中方的精心安排成为撼动日本民间对华舆论的重要因素。<sup>④</sup>在这些努力下，中日民间交流逐步推进，中国也开始在可能的范围内摸索包括邦交正常化在内的各种改善两国关系的办法。<sup>⑤</sup>在此情况下，1954年12月，中国国务院外交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统一战

① 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第55~56页。

②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414~415页。

③ 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第55~56页。

④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卷，第6~7、158~169页。

⑤ 《郭沫若接见池田政之辅就我保卫和平运动和中日关系发表谈话》（1953年10月29日），《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119~120页；《论中日关系》，《人民日报》1953年10月30日社论；《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关于对日政策部分）》（1954年12月21日），《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143页。

线工作部联合决定扩大研究日本的工作，其后在 1955 年成立了负责进行日本研究和规划并实施对日政策的对日工作委员会。<sup>①</sup>委员会主任由知日派著名文学家郭沫若担任，副主任为廖承志、陈家康、王芸生，委员包括雷任民、刘宁一、南汉宸，而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则是廖承志。<sup>②</sup>

据吴学文介绍，1955 年伴随着对日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日本组的会议成员也相对固定。<sup>③</sup>1955 年以后主要会议的参加成员，吴学文的总结如下。<sup>④</sup>

外交部：陈抗、丁民（有时韩念龙也出席）  
 中联部：赵安博、庄涛（有时张香山也出席）  
 对外贸易部：李新农、吴曙东（有时雷任民也出席）  
 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杨春松、李国仁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谢筱道（有时冀朝鼎也出席）  
 中国对外友好协会：林林、孙平化、金苏城  
 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吴茂荪、萧向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文迟  
 中华全国总工会：陈宇  
 人民日报社：萧光、裴达（有时国际部主任也出席）  
 中国广播事业局：张纪明、吴克泰（有时温济泽也出席）  
 新华社：丁拓、吴学文（有时邓冈或李炳泉也出席）

如此形成的日本组的对日工作机制，如图 1 所示，具有混合各部门力量的横向联合工作组的性质。据王俊彦、吴学文的

① 王仲全、孙焕林、赵自瑞、纪朝钦：《当代中日民间友好交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第 3 页。

② 本田善彦『日・中・台視えざる絆 中国首脳通訳のみた外交秘録』日本経済新聞社、2006、230～231 頁。

③ 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第 56 页。

④ 根据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第 56 页，由笔者整理。

分析，被派到各机关的对日工作人员，平时负责自己单位的具体工作，但每次日本组有工作他们都会根据需要进行分派给他们的不同任务。<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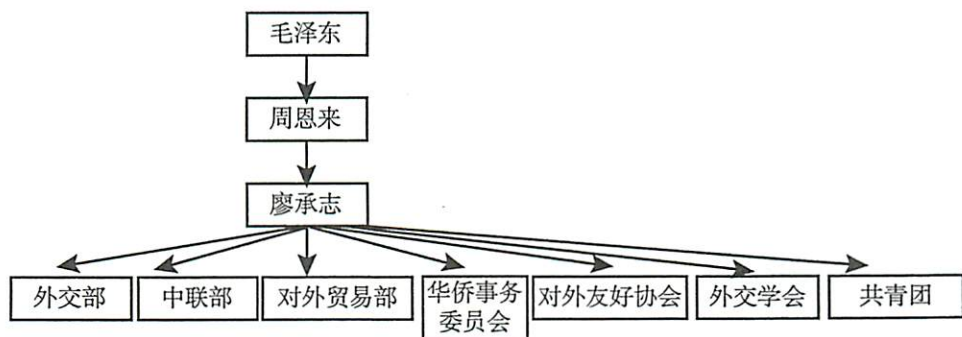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的对日工作机制（1952～1966）

资料来源：根据吴学文的《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吴学文、王俊彦的《廖承志与日本》以及笔者对原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丁民的采访（2011年11月23日，北京），由笔者整理制作而成。

### 3. 国务院外办日本组领导时期（1958～1966）

由廖承志逐步构筑起来的中国对日工作机制，在1958年3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日本组成立之后则更为制度化。<sup>②</sup> 1958年2月，周恩来辞去外交部部长职务，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据《王稼祥年谱》记载，1958年3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中共中央之下设立外事小组，国务院之下设立外事办公室。中共中央外事小组负责外事工作全盘业务，同时撤销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其业务改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负责。<sup>③</sup>

由此1958年以后中国的外事工作都由中共中央外事小组和国务院直属的外事办公室统辖。图2为这两个负责外事工作

① 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第116～117页；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第55～56页。

② 对原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丁民的电话采访，2013年12月23日，北京。

③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第454～455页。

的部门的组织比较图。中共中央外事小组的组长、副组长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均为陈毅、廖承志，可以看出虽然机关分为两个，但主要成员却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个机关在开展工作时基本上是并行连动的。<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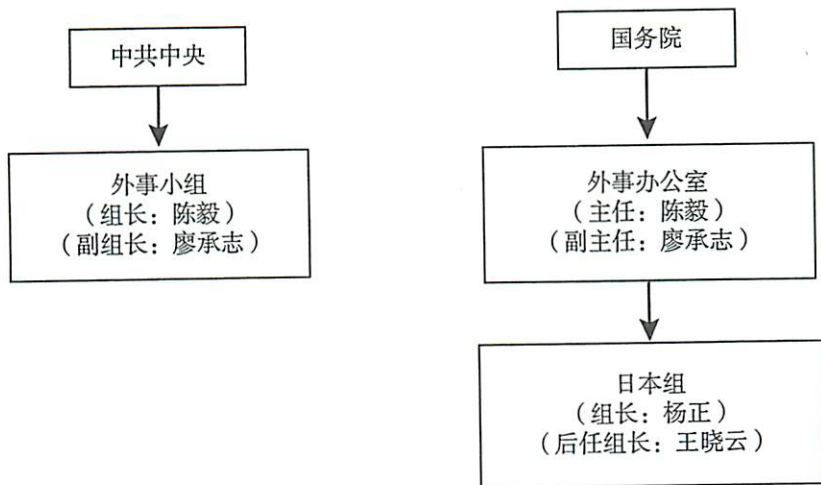


图2 中共中央外事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组织比较图

资料来源：根据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第116～117页，由笔者整理制作而成。

随着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的撤销，在该委员会之下的日本组的工作也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下设的日本组接管。据吴学文回忆，虽然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日本组的组长是杨正（后为王晓云），但它一直是直接受廖承志领导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日本组首先由廖承志召集各政府机关、部门的外事负责人，举行会议研究和讨论对日相关工作。其后日本组实际上起到了召集各部门对日工作人员的作用，廖承志则负责主持，日本组的会议成为传达对日工作的政策、方针、日本形势，再对其进行讨论、研究、学习的场所。每次的会议内容都与中日关系有关，形成了参加者可以自由讨论的气氛。因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中廖承志与陈毅、周恩来的个人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一般

<sup>①</sup> 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第116页。

情况下日本组的会议结果都会很快传达给周恩来和毛泽东，另外，毛、周那里决定的对日工作政策也多由周直接传达给廖承志。由此实现了在日本组的会议上直接分派工作，再由各部门的对日工作人员分工完成的工作方式。<sup>①</sup>

根据吴学文的回忆，参加会议的人员并不都与日本组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这种对日工作方式本身不拘泥于形式，机构名称也没有公开。但是，由日本组和廖承志所创立的这种工作方式，有利于廖承志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汇报工作等方面进行直接的联系与沟通，便于接受和传达指令，而工作人员的工作成果也易于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故此，出现各机关来参加日本组工作的人员都非常积极踊跃的局面。<sup>②</sup>

日本组会议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六个方面。<sup>①</sup>学习政府和中央的对日工作政策、方针。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日本人及日本访问团时的谈话记录。<sup>②</sup>讨论各个时期的国内外形势，研究对日民间外交的具体工作内容。主要是从日本邀请什么样的代表团，或者派遣什么代表团去日本访问等。20世纪50年代，与日本代表团相关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由日本组提出方案，由出席会议成员所在的各机关做好具体的接待或访问计划，然后向外事办公室提出申请，最后由外事办公室最终决定。<sup>③</sup>当日本政局出现变动或发生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事件时，日本组一定会召集会议、研究对策，有时还会请专家做报告。如曾请谢南光讲过政治形势、请杨春松介绍过华侨工作、请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对经济形势进行分析等，举行过多次各种形式的此类活动。一般情况下，经过专家和日本组成员讨论之后，由日本组进行梳理、归纳，总结提出相应对策，最后将提案提交给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sup>④</sup>日本组经常就日本形势进行讨论，议定出具有前瞻性、预见性的对日政

<sup>①</sup> 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第55～56页。

<sup>②</sup> 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第55～56页；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第116～117页。

策，也会从长远的角度来研究并向上级领导提出对日政策建议。⑤密切关注日本政局，分析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研讨对日工作的最佳时机，向中央政府直接提出议案并具体执行这些对策。① ⑥对周恩来决定的对日工作业务，研究实施方案，决定工作分工，然后由各参加成员分头实施。②

通过以上说明可以看出，以日本组为中心的对日工作方式是包含收集日本信息、分析日本形势、制定并实施派遣和接收访问团等友好交流工作、向中央政府以及领导层提交提案等的一个具有全方位横向合作功能的特殊体制。③

之后，因为1964年4月20日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签订了《关于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交换常驻记者的备忘录》，就中日之间互派代表、互设联络事务处、交换新闻记者等问题达成了一致。④日本政府强调其民间交流的性质，对于互设联络事务处、交换记者等问题在原则上也没有提出异议。⑤可是由1964年8月13日到达东京的孙平化、吴曙东、陈抗等人设立的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的所长，却是由中国政府中有名的对日工作负责人之一孙平化来担任，其职员很多也是从中国外交部派出的，⑥员工的工资基本上也

① 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第55～56页。

② 《2007年0415口述历史：萧向前讲述中日建交秘闻》，凤凰网，<http://v.ifeng.com/his/200907/0e6c5bb3-1149-45b2-a065-5baa83330f15.shtml>，2010年9月10日。

③ 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第55～100页；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第116～121页；对回国留日学生E（原《人民日报》记者，中央编译局译审）的采访，2009年2月23日，北京。

④ 《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关于互派代表、互设联络事务所、交换记者和备忘录贸易会谈纪要》（1964年4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1299-03。

⑤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230页。

⑥ 《关于廖承志同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干部配备和轮休问题的函件》（1964年5月21日～1965年9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22-00281-01。

设定为与中国外交部的驻外国大使馆馆员同等级别的水平。<sup>①</sup>之所以强调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的民间性质，是因为日本政府需要借口以向台湾当局进行解释。但是从职员、组织形式、设置条件等情况来看，谁也不能否认其具有中国政府代表处的性质。可以说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的设立，是廖承志和他的团队对日工作的成果，也为日后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开辟出了一条半官半民的交流之路。

#### 4. 周恩来全面主持对日工作时期（1966～1972）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廖承志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1967年以后在对日工作的公开场合没有了廖的身影。据丁民回忆，“文革”开始后，因为多数对日工作人员被下放到干校，所以周恩来总理只能亲自指挥对日工作的具体事务。虽然在“文革”初期，廖承志还可以以顾问身份列席会议，但到1969年以后，中国的对日工作基本上全部被置于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之下（见图3）。周恩来定期召集各部门负责对日工作的人员，进行分析日本的相关信息、研讨对策、商议工作分工等事项。当时丁民作为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每次都列席会议。<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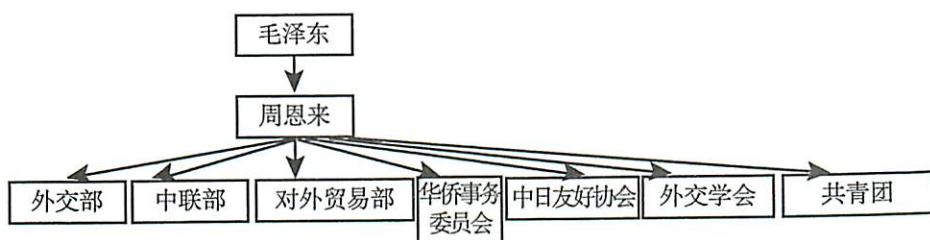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的对日工作指导体制（1966～1972）

资料来源：根据对原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丁民的采访（2011年11月23日，北京），由笔者整理制作而成。

① 《关于确定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人员的工资标准的报告》（1965年3月10日～1965年4月1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28-00045-05。

② 对原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丁民的采访，2011年11月23日，北京。



1971年，因为基辛格秘密访华，处于停滞状态的中日关系开始出现了变化。同年8月20日周恩来借松村谦三逝世的机会，为中日外交寻求突破，开始寻找“解放”廖承志的方案。<sup>①</sup>

在廖承志复出之前的中国对日工作舞台上，“廖承志四大金刚”之一的王晓云开始受到关注。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60余人分乘两架飞机奔赴东京。虽然团长为赵正洪，而副团长却是原国务院外办日本组组长王晓云。以王晓云、王效贤为首的对日工作组主要负责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交流，离开乒乓球比赛场地后，用了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去日本各地访问，在日本各地掀起了一股所谓的“王旋风”。<sup>②</sup> 王晓云其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之际，还以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的身份参加谈判，负责准备联合声明的文书工作。<sup>③</sup> 1971年这一年中，“四大金刚”之一的萧向前也从下放的农村被召回北京，1972年7月，被任命为备忘录贸易东京联络事务所（原“廖高贸易”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的首席代表，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起到了联络人的作用。<sup>④</sup>

廖承志复出比其前部下稍晚一些，是在1971年的下半年。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廖承志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以外交部顾问的身份再次回来参加对日工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收集信息，尽其所能与日本政界、商界发展人脉。如此，廖承志和他的团队努力推行的中日民间外交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巨大作用。<sup>⑤</sup>

① Kurt Werner Radtke, *China's Relations with Japan, 1945-83: The Role of Liao Chengzhi*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92-195.

② 钱江著、神崎勇夫译『米中外交秘録——ピンポン外交始末記』東方書店、1988、79頁；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第73页。

③ 《王晓云：国务院外办日本组负责人》，王俊彦《中日关系掘井人——记45位中日友好的先驱》，第183~190页。

④ 《萧向前：对日工作的铺路人》，王俊彦《中日关系掘井人——记45位中日友好的先驱》，第201~211页。

⑤ 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第96~101页。

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签署,日本政府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选择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虽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对日外交的具体工作转移到负责官方外交的外交部,但廖承志依然以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等身份继续活跃在对日外交的舞台上。<sup>①</sup>

## 五 民间力量与对日友好活动的开展

因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日关系强调的是民间交流,所以主要是在经济交流、文化交流、人员交流等层面进行的。但是,在尚无正式外交关系的环境下,中国不能在日本设立大使馆、常驻代表处等办事机构。所以,在日本收集信息、为中国进行宣传活动等,都成为新中国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故此,以国内为基地推动以最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目的的对日交流活动,中国政府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 1. 收集日本相关信息,分析日本局势

开展对日工作,首先要了解日本,即收集日本的相关信息、分析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等。中国在日本没有使领馆、代表处,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对日本媒体公开的信息进行分析、梳理和总结。如据1956年回国之后被选为对日工作人员的归国留日学生F的回忆,当时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每天翻阅日本的各大报纸、杂志,选出其中较为重要的新闻翻译成中文,提交给上司。留日学生F的上司也是参加日本组会议的成员。<sup>②</sup>在会议上所讨论的议题、信息,很多是这些精通日语的下层对

<sup>①</sup> 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第262~263页;《廖承志:冲开中日交往之路》,王俊彦《中日关系掘井人——记45位中日友好的先驱》,第86~107页。

<sup>②</sup> 对留日学生F的采访,2009年2月21日,北京。

日工作人员翻译总结出来的。

除了报纸、杂志外的另一个日本信息来源则是日本的广播电台。据丁民回忆，按照廖承志的提议，后来将日本广播电台的广播内容整理编辑成名为《日本广播资料》的内部资料。<sup>①</sup>曾经担任过战后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华侨总会干部的留日学生P回国后，被分配到了外交部，后又被调到新华社，负责收集日本的相关信息。其主要任务就是翻译日本电台广播的记录文稿。P说，当时在新华社中，有一个负责收听并记录日本广播的团队，包括P在内的这些翻译人员每天将记录下来的广播节目内容彻夜翻译成中文，翌日一早印刷后，制作成内部资料送交各部门的领导。<sup>②</sup>

## 2. 对日宣传活动（通过广播、报纸、杂志等）

1950年3月，中国外交部国际司为了将土地改革、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人民生活等情况向外国宣传，向外交部办公厅、文化部等有关部门提交报告书，建议应该利用电影、画报、报纸、杂志等在外国扩大宣传力度，此申请很快就得到了“同意”的批示。<sup>③</sup>中共中央一直非常重视宣传工作。1949年6月，时任新华社社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廖承志，就兼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一职。<sup>④</sup>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原广播员陈真回忆，新华广播电台<sup>⑤</sup>就曾计划扩大日语广播。抗战时期，为了感召日本军人就已经开始了日语广播，在国共内战期间，也曾经向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和被南京国民政府留用的日本人进行广播，主要任务就是宣传战况。但是，当全国解放

① 对原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丁民的采访，2011年11月23日，北京。

② 对留日学生P的采访，2009年9月2日，北京。

③ 《外交部关于对外宣传问题的报告》（1950年3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3-00055-03。

④ 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第258~259页。

⑤ 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时在日本被称为“北京放送”。

的形势基本形成之后，新华广播电台的日语广播就转为面向日本国内的日本人、留日华侨和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等，向他们宣传新中国的政策和信息。被父亲的朋友廖承志挑选出来到只有4个工作人员的新华广播电台日语广播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从台湾回国的留日华侨陈真当时只有16岁，后来他成为在新华广播电台里面负责汉语教学等固定节目的主要广播员。当时的新华广播电台日本组中，有一位日本广播员原清子，其他3位广播员是从日本回国的华侨，后来随着队伍的逐渐扩大，日本广播组逐渐变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组织庞大的部门。广播内容也逐渐拓宽，包括毛泽东的文章、中国政府的新政策，有时还会介绍一些社会的变化，每天的广播时间从原来的15分钟逐渐延长，日本听众也逐渐增加。<sup>①</sup>

除陈真之外，笔者在采访1963年被分配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已经退休的曾负责过对日广播工作的归国留日华侨陆汝富时，他介绍1963年电台的日语组已经拥有成员40人，而且其中超过半数是从日本回国的华侨，还有近半数是日本人。<sup>②</sup>据说只有3人是在中国国内培养出来的，而且这3人都是北京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陆还介绍1960年以后廖承志也经常直接指导他们制作对日广播的内容。<sup>③</sup>

除了电台广播以外，当时中国政府还出版日文杂志，免费发给日本国内的机关单位、亲华团体和个人。其中，广为人知的杂志有《人民中国》、《北京周报》和《中国画报》等。<sup>④</sup>

《人民中国》日文版于1953年6月1日创刊，之前英文版

① 野田正彰『陳真——戦争と平和の旅路』岩波書店、2004、95～157頁。

② 这些日本人有些是受到盟军驻日本总司令部打压赤色分子的影响来到中国的日本共产党党员，有些是因为个人理由从日本到中国的日本人，还有随在日华侨回国的日本家属，他们中有演员、军人等。

③ 对留日华侨陆汝富的采访，2009年9月1日，北京。

④ 水谷尚子『「反日」以前——中国対日工作者たちの回想』文藝春秋、2006、139頁。

和俄文版已经出版发行，是一份为中国做对外宣传的杂志。<sup>①</sup>据战前曾在日本留学、抗战开始后回国参加革命的台湾留日学生康大川回忆，《人民中国》日文版是经他当时的工作单位外文出版社的领导提议，经中联部和出版总署批准后，开始出版发行的对日宣传杂志，在当时这是中国发行的唯一一份日文杂志。1955年3月，在廖承志领导下，《人民中国》日文版记者康大川和翻译刘德有、安淑渠随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商谈《人民中国》在日本的出版发行、销售等问题，并就杂志的报道内容、读者群体等各种问题征求日本各界人士的意见。1956年12月，《人民中国》日文版得到日本政府的认可，取得在日本国内作为“第三种郵便”的合法地位，成功得到在日本的发行权。1957年3月，经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授权，《人民中国》日文版向日本光文社提供日本战犯忏悔录的文稿，名为《三光》，在日本出版以后，仅在两个月之内就销售了超过20万本。这是《人民中国》日文版和日本的出版社同时出版的第一部著作。<sup>②</sup>如此《人民中国》日文版在日本的影响力逐步扩大，逐渐成为中国对日宣传的重要渠道。

为了出版《人民中国》日文版，编写、校正报道的内容并对其进行编辑，需要大量精通日语的人才。创刊前，康大川就从东北招聘多名日本专家、6名外国工作人员以及懂日语的中国员工，创刊后又从回国的留日学生和华侨中选拔了多名工作人员。如20世纪50年代回国的蔡德基、赖民姬、刘德权、杨哲三等都曾在《人民中国》日文版工作过。<sup>③</sup>

继《人民中国》日文版出版发行之后，1954年1月《人

① 刘德有『時は流れて——日中関係秘史五十年』上巻、藤原書店、2002、60～62頁。

② 「康大川回想録中国の日本語雑誌『人民中国』初代編集長の生涯」水谷尚子『「反日」以前——中国対日工作者たちの回想』、137～225頁。

③ 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编印《联络员用在京日本归侨侨眷通信录》，2007，第1～17页。

民画报》日文版（对外称《中国画报》）、1963年8月1日《北京周报》日文版也相继创刊并发行。因为中国相继发行自己的日文刊物并向日本销售和配发，逐渐形成了另一种宣传中国的渠道。另外，对日文版《中国画报》和《北京周报》的编辑工作，也有众多的留日学生、华侨参与其中。<sup>①</sup>

## 结 语

在冷战的环境下，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新中国的对日外交从其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1952年，日本政府签署“日华和平条约”，继续维持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与中国大陆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的状态长期持续。对于中国来说，打开与日本的关系，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成为重要的外交课题之一。<sup>②</sup> 为了推进与日本的外交，中国决定推行“以民促官”的政策。“以民促官”是由毛泽东、周恩来提议并推行的一种交流方式，这一政策是从扩大经济、文化层面的交流入手，以达到缔结外交关系的最终目的。<sup>③</sup>

1952年春，中国政府将以最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目标的中日民间外交的重任交给了廖承志。其后直至“文革”开始，中国的对日外交基本上都是通过廖承志执行的，当然他的所有活动都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进行的。廖承志忠实地贯彻执行毛、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工作方针，始终坚持实行对日友好的外交政策。<sup>④</sup> 廖在与周恩来的信任关系的基础上，组建了与中共中央和政府机关各部门具有横向连

① 对留日华侨林国本的采访，2007年11月26日；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编印《联络员用在京日本归侨侨眷通信录》，第1~20页。

②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卷，第6~7页。

③ 《毛泽东：中日关系的缔造者》，王俊彦《中日关系掘井人——记45位中日友好的先驱》，第2~19页。

④ 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第116页。

动共同合作性质的对日工作组。这一工作组的工作形式基本成型，并被制度化是在1958年。1958年3月，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成立为契机，以廖承志为首的国务院外办日本组的领导机制得以形成，到1966年“文革”开始之前，这一工作机制始终统筹管理中国的对日工作。1964年“廖高贸易”协定签订之后，中日双方在东京开设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在北京开设了高碓达之助北京事务所。即便在“文革”中廖承志被隔离后，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的驻日人员不断减少，但他们也一直没有停止工作。可以认为，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在中国收集日本信息、与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进行联系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革”开始以后，廖承志被隔离审查，外办日本组的领导力量明显下降，其后直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亲自指挥，督导外交部、中联部、外办及中国各民间团体的对日工作。

中国对日工作组的人才选拔、培养以及工作方式的构建，是1952~1958年完成的。从1958年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成立时建成了以日本组（最高负责人为廖承志）为首的对日工作领导机制，并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革”开始。这一领导机制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日外交，绝不能不谈廖承志。

成立之初的新中国面临人才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对日工作人员方面，更因为其特殊要求和历史原因，人才不足的情况更显突出。在此情况下廖承志从留日学生、留日华侨中选拔培养了许多对日工作人员。新中国成立初期将改善对日关系作为外交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在冷战环境下，由于不能实现官方接触，为了开展工作，中国打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对日外交不限于外交部，而是在包括妇联、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编辑部等单位的所谓民间团体中，也都配备了相当多的对日工作人员，负责对日工作

各方面的具体业务。而他们多是熟知日本，并了解日本人想法的回国留日学生、留日华侨。中国的对日工作竭尽全力采取攻心策略，采用抓住日本人民的心、尽量满足日方要求的工作方式。其结果就是日本国内舆论对中国的亲近感持续上升，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也逐渐扩大。尽管仍然处于“文革”的动荡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却仍得以实现，可以说这正是中国对日民间外交战略带动日本民间舆论变化的成果，当然这一成果也是在中国对日民间外交的以廖承志为首的工作组的努力下实现的。<sup>①</sup>

这种对日工作方式在外交史上非常特殊，它的成功在很多层面主要是依靠廖承志个人的人脉和人格魅力。这种工作方式，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和廖承志的去世而宣告结束，政府间的中日外交全部转到外交部。另外，由廖承志组建的对日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也在其后转到台湾工作等其他工作部门，转到外交部继续负责对日工作的为数极少。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他们相继去世，中日之间的高层次交流随之减弱，这也成为当今中日关系出现问题则长时间不能恢复的原因之一。

## 参考文献

### 日文文献

井口治夫・松田康博（2007）「日本の復興と国共内戦・朝鮮戦争」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井上正也（2010）『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王雪萍（2007）「中国の文化外交——留学生派遣を含めた人材交流に見る戦略」川島真編『中国の外交——自己認識と課題』山川出版社。

① 森田一著、服部龍二・昇亜美子・中島琢磨編『心の一燈——回想の大平正芳 その人と外交』第一法規、2010、105～106頁。



王雪萍（2009）「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東京大学出版会。

王雪萍（2010）「中華人民共和国初期の留学生・華僑帰国促進政策——中国の対日・対米二国間の交渉過程分析を通じて」『中国 21』33巻、2010年7月号。

王雪萍（2013）「廖承志と廖班の対日業務担当者」王雪萍編『戦後日中関係と廖承志——中国の知日派と対日政策』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王雪萍（2013）「中国の対日政策における留日学生・華僑——人材確保・対日宣伝・対中支援」王雪萍編『戦後日中関係と廖承志——中国の知日派と対日政策』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大澤武司（2003）「在華邦人引揚交渉をめぐる戦後日中関係——日中民間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研究』第49巻第3号、2003年7月。

銭江著、神崎勇夫訳（1988）『米中外交秘録——ピンポン外交始末記』東方書店。

添谷芳秀（1995）『日本外交と中国 1945～1972』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陳肇斌（2000）『戦後日本の中国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

日中友好協会編（2000）『日中友好運動五十年』東方書店。

野田正彰（2004）『陳真——戦争と平和の旅路』岩波書店。

本田善彦（2006）『日・中・台視えざる絆 中国首脳通訳のみた外交秘録』日本経済新聞社。

水谷尚子（2006）『「反日」以前——中国対日工作者たちの回想』文藝春秋。

毛里和子（2006）『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新書。

森田一著、服部龍二・昇亜美子・中島琢磨編（2010）『心の一燈——回想の大平正芳 その人と外交』第一法規。

「廖承志文集」編輯辦公室編、安藤彦太郎監訳（1993）『廖承志文集』下巻、徳間書店。

劉徳有（2002）『時は流れて——日中関係秘史五十年』上巻、藤原書店。

中文文献

陈国文：《廖承志与中日民间外交》，《中共贵州省党委党校学报》总 105 期，2006 年 5 月。

陈国文：《廖承志与中日友好事业统一战线的建立》，《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4 卷第 5 期，2006 年 9 月。

陈国文、邓卫红：《廖承志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6 年第 5 期。

陈国文、邓卫红：《廖承志与日侨回归》，《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6 卷第 5 期，2008 年 9 月。

郭伟伟：《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回国五十年》编写组《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

李荣德：《廖承志》，永升书局，1992。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齐鹏飞主编《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1949～200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芮敏：《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见证人——王效贤》，《对外大传播》2003 年第 5 期。

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

孙平化：《我的履历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铁竹伟：《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1998。

王炳南：《回忆周总理在外交工作中几个片段》，《世界知识》1979 年第 1 期。

王俊彦：《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2006。

王俊彦：《中日关系掘井人——记 45 位中日友好的先驱》，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王仲全、孙焕林、赵自瑞、纪朝钦：《当代中日民间友好交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薛学共、黄小用编著《周恩来超群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三联书店，1984。

#### 英文文献

Kurt Werner Radtke, *China's Relations with Japan, 1945 - 83: The Role of Liao Chengzhi*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立与共存的历史认识：日中关系 150 年/刘杰，  
(日)川岛真编；韦平和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5.9

ISBN 978 - 7 - 5097 - 8043 - 5

I. ①对… II. ①刘… ②川… ③韦… III. ①中日  
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IV. ①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8775 号

## 对立与共存的历史认识

——日中关系 150 年

---

编 者 / 刘 杰 [日]川岛真

译 者 / 韦平和 徐丽媛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徐碧姗

责任编辑 / 徐碧姗 邵璐璐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32.25 字 数：447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043 - 5

定 价 / 118.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对立与共存的历史认识

---

## 日中关系150年

刘杰 [日]川岛真 编

---

韦平和 徐丽媛 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为日中青年历史学术会议的第三部成果，探讨了自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近150年的中日关系。

全书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在历史和文化上渊源至深的中国和日本对对方的认识，特别是认识中的误解和分歧。

第二部分主要研究试图在中日关系中既保障本国的“国家利益”，又使两国“共存”的政治家、外交官、军人和知识分子等的各种活动。

第三部分关注在中日两国漫长的对立和断交时期仍然存在的多重交流渠道和谈判场合中，两国政治家、外交官、企业家和民间人士如何利用各自人脉参与中日关系，以及他们的活动给两国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 对立与共存的 历史认识

日中关系150年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上架建议：中国历史

ISBN 978-7-5097-8043-5



ISBN 978-7-5097-8043-5

定价：118.00 元